

隋唐墓出土的陶人面鳥

謝明良

國立臺灣大學藝術史研究所

提 要

中國隋唐時期墓葬往往可見呈人面、鳥身造型的陶人面鳥。本文梳理了這類陶人面鳥的出土分布，基本確認其主要是出土於河北、湖南和湖北及周邊區域，屬於區域性的陪葬墓俑；而從陶人面鳥在墓葬中的出土位置，另可推測此類陶俑可能具有護衛墓室的功能。由於陶人面鳥的區域性消費形態，因此有助於學界結合其他俑類而釐定出唐帝國幾個內容種類互有差異的「明器文化圈」，對今後深入考察唐代墓葬文化很有參考價值。另外，本文以河北省邢窯出土標本為例，討論了陶人面鳥的跨省區販路，認為唐代販售、出借葬儀用器的所謂「凶肆」之物流，應該是墓葬陶俑得以跨區流通的重要因素。

關鍵詞：人面鳥、唐代陶俑、明器文化圈、凶肆

一、前言

在隋代或唐代的墓葬中，有時可見呈人面、鳥身造型半人半禽的陶俑。這類陶俑因地區而在細部造型上有所差異，但一般都是兩件成對入壙陪葬。以河北省南和縣垂拱四年（688）郭祥夫婦合葬墓為例，兩件俑均身著對襟寬袖衣，揖手於胸前，其中一件人面、鳥身，頭束高髻，另一件面容呈人面鳥喙，其餘造型身姿略同前者，通高 17 公分（圖 1）。發掘報告書對於這類人面鳥身俑的命名並不一致，有「人身禽身」、「人頭雞身」、「人身鳥身」、「人面鳥」、「人首獸身」或「觀風鳥」、「千秋萬歲」等稱謂，而以「觀風鳥」最為常見，¹ 上引郭祥墓報告書也是將之稱為「觀風鳥」。

類似造型的兩件一對且年代更早的出土例則見於安徽省隋墓，此即 1970 年代發掘報導的合肥市郊杏花村隋開皇六年（586）墓。該墓所出陶「人面鳥」上身人形，下身鳥形，著對襟寬袖衣，雙手藏於袖內拱於胸前，鳥尾高翹，肢下三爪，一呈戴冠的男人面，一呈梳雙髻的女人面，通高 24 至 29 公分（圖 2）。從造型特徵或成對組合等情況看來，其和前述唐墓陶人面鳥身俑應是有著同一屬性的葬俑。同樣是在 1970 年代，王去非已曾援引《隋書·王劭傳》說開皇年間有人得白石，上有文理，「又有卻非及二鳥，其鳥皆人面，則《抱朴子》所謂『千秋萬歲』也」，進而指出前引合肥隋墓出土的人面鳥身俑，應即東晉《抱朴子》所謂「千歲之鳥，萬歲之禽，皆人面而鳥身，壽亦如其名」（內篇·卷三《對俗篇》）的長壽禽鳥。² 本文同意這個看法，因此也將隋唐墓出土的此類造型陶俑視為文獻所載的「千秋」、「萬歲」。其次，王氏前引文另提到河南鄧縣學莊南朝墓出土（採集）的一塊「千秋萬歲」彩色畫像磚，帶「千秋」字銘一側的人面鳥呈女子面容、鳥身，而有「萬歲」二字的一側則呈獸頭鳥身（圖 3），王氏認為，由於其形姿與「皆人面鳥身」（《抱朴子》）的記述不符，因此懷疑另有所說。³ 關於這點，從近數十年來陸續公布的材料看來，「千秋」、「萬歲」圖像既見陶俑、施罩青釉的青

1 「觀風鳥」一名見於金元時期地理葬書《大漢原陵秘葬經》，名既曰鳥，應作鳥形，但具體造型尚待確認（徐蘋芳，〈唐宋墓葬中的「明器神煞」與「墓儀」制度——讀《大漢原陵秘葬經》札記〉，《考古》，1963 年 2 期，頁 87-106）。將隋唐墓出土千秋、萬歲比附為觀風鳥者，如〈淺議觀風鳥在墓葬中的作用〉，《文博》，2007 年 5 期，頁 44-47；〈觀風鳥源流研究〉，《文物春秋》，2007 年 1 期，頁 38-44；〈唐宋墓葬中的觀風鳥研究〉，《華夏考古》，2010 年 2 期，頁 112-119，但說法牽強又乏論證，本文不予引介。

2 王去非，〈隋墓出土的陶千秋萬歲及其他〉，《考古》，1979 年 3 期，頁 275。

3 王去非，〈隋墓出土的陶千秋萬歲及其他〉，頁 275。

瓷俑或畫像磚，也見於墓室壁畫。其中以畫像磚和壁畫的年代較早，值得注意的是，此類圖像集中分布於北方地區，有的帶榜題，如朝鮮平安南道南浦市江西區域（平壤）高句麗永樂十八年（409）德興里古墳前室西壁墓頂畫，位於上方的女人面鳥旁有「千秋之象」題字，其下方有「萬歲之象」題字的圖像則呈男人面鳥身（圖4）。另外，著名的洛陽西漢卜千秋壁畫墓室東側破風處繪人面鳥身像，頭上有髻，似女子，西側破風處繪豬頭人身像（圖5）。雖然學界對於該墓壁畫圖像的比定未有共識，如孫作雲就主張東側的人面鳥身像即仙人王子喬，⁴林已奈夫反對此說，認為漢代未見人、鳥混濁的仙人圖像，因此既贊同王去非的說法也援引合肥隋墓人面鳥身陶俑指出，卜千秋墓破風處的圖像，即《抱朴子》「千歲之鳥」、「萬歲之禽」，認為其是象徵千秋萬歲的吉祥圖，進而將「千秋」、「萬歲」圖像溯自漢代，⁵但亦難確證，只是聊備一說。其次，江蘇省鎮江市東晉隆安二年（398）畫像磚墓所見人面鳥身磚和獸首鳥身磚（圖6），是否一定要和報告書所提示《山海經·中山經》輝諸至蔓渠之山「其神皆人面而鳥身」的記載相提並論也是仁智互見，因其不排除可能即「千秋」、「萬歲」圖像。另外，遼寧省朝陽鄉四世紀後期前燕墓（88M1）出土的銅鑲金鏤空鞍橋包片，在正中的對鳳紋兩側分別見有面朝中央的人面鳥身像（圖7），林聖智認為此或即「千秋·萬歲」圖像。⁶

總之，帶榜題的「千秋」、「萬歲」圖像可早自五世紀初（德興里古墳）所見為一男面（千秋），一女面（萬歲），但六世紀畫像磚（鄧縣墓）「千秋」呈人面鳥身，「萬歲」呈獸首鳥身。其次，吉林省集安相對年代在五至六世紀初的天王地神塚壁畫，帶「千秋」題字的為人面鳥，但獸面鳥身像則無題識。另外，雖無題識但可從其外觀造型特徵和排列方式得以推知洛陽北魏永安二年（529）荀景等北魏期石墓誌蓋殺刻所見頭部相向的男面和女面鳥身像很有可能亦屬「千秋」、「萬歲」（圖8）。應該一提的是，橫河民輔藏北齊天保八年（557）畫像殘磚（被截切改製成硯）「千秋」題字下方為頭帶雙髻的女人面鳥身，「萬歲」字以下缺失（圖

4 孫作雲，〈洛陽西漢卜千秋墓壁畫考釋〉，《文物》，1977年6期，頁21-22。

5 林已奈夫，〈洛陽卜千秋壁畫に対する注釋〉，《漢代の神神》（京都：臨川書店，1989），頁299-302。另外，王銘引晉人張華《博物志》認為人面鳥身的千秋萬歲鳥乃是孟舒與鳳凰結合的形象，並以漢代「千秋萬歲」字銘磚為例，認為人面鳥身祥瑞在漢代已廣為流傳。參見同氏，〈唐宋墓葬中的千秋萬歲鳥與觀風鳥不同形象辨析、歷史來源及象徵意義〉，《江漢考古》，2014年1期，頁94-101，文中另引謝曉燕，〈中國古代的「千秋萬歲」瓦當與「人面鳥身」圖像〉，《中國社會科學報》，2009年10月29日第5版（參見網址：<https://www.chinafolklore.org/web/index.php?NewsID=6258>，檢索日期：2020年10月23日）

6 林聖智，〈圖像與裝飾：北朝墓葬的生死表象〉（臺北：臺大出版中心，2019），頁83-84。

9)：1990年代河北省三台村東北也出土了帶「□齊天□年造」的畫像磚，其上印女人面鳥身圖像（圖10）。而近年望野博物館公布的「大魏興和二年造」（東魏興和二年，540年）磚拓本，「萬歲」右側為帶雙髻的女人面鳥身像，「千秋」左側則為帶冠的人面鳥身像（圖11）。⁷從河北東魏、北齊墓室磚頻見「千秋」、「萬歲」人面鳥圖像，而被比定為北齊文宣帝高洋武寧陵（乾寧元年，560年）的磁縣灣漳大墓，東壁和西壁壁畫所見分別呈男面和女面的人面鳥，也已由報告書指出應是「萬歲」和「千秋」。⁸可知之後河北省唐墓流行以陶人面鳥俑入墓的習俗其來有自。

二、陶人面鳥的性質

除了從文獻記載或字義上來理解「千秋」、「萬歲」即人面鳥的祥瑞屬性，考古所見其在墓室的陳放位置更是如實地呈現了這類陶俑於墓葬中的角色。以下以兩座可大致判明陶俑等出土位置的墓葬為例，做一說明。

（一）安徽省合肥隋開皇六年（586）墓

墓室為磚結構，由斜坡式土墓道（ $4 \times 3.16 \sim 2.02$ 公尺）、甬道（ $1.67 \times 1.37 + 2.17$ 公尺）、墓門（ 2.18×1.4 公尺）、主室（ $4.03 \times 1.93 + 33$ 公尺）以及主室前側左右耳室所構成。墓曾遭盜掘，但部分陶俑仍陳放在原來位置，未被移動（圖12）。從平面圖看來，墓誌左右兩側分別置放人面鎮墓獸（編號6）和獸面鎮墓獸（編號3），男人面鳥陳放在獸面鎮墓獸正後方（編號4），女人面鳥設置在人面鎮墓獸正後方（同圖2）（編號7），以上兩件人面鳥的斜後方近室壁處，另陳置尺寸明顯大於其他武俑的按盾武士俑（編號5、8，高50.52公分）。從人面鳥是陳放在室前部近墓門處人獸面鎮墓獸的正後方，按盾武士俑的前方，可知是具有護衛墓室的功能。

7 閻焯主編，《盛世和平：「一帶一路」下的唐代文物》（南寧：廣西美術出版社，2017），頁21。另據同圖錄說明另引《鄴中記》：「古瓦大者方四尺，上有盤花鳥獸紋，千秋萬歲字，其紀年非天保則興和，蓋東魏北齊也。又有古磚筒者，花紋年號如磚，內圓外方用承檐溜，此亦可為硯」，表明此類千秋、萬歲磚常被改裝成硯。另外，朱岩石也已提示上引東魏興和二年、北齊天保年，甚至寧夏固原北魏墓的人面鳥均屬「千秋」、「萬歲」圖像。見同氏，〈「千秋萬歲」圖像源流淺識〉，收入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漢唐與邊疆考古研究編委會編，《漢唐與邊疆考古研究》（北京：科學出版社，1994），第1輯，頁131-135。

8 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等，《磁縣灣漳北朝壁畫墓》（北京：科學出版社，2003），頁164及彩圖38之1、48之2。

（二）河北省南合縣唐垂拱四年（688）郭祥夫婦墓

正南向磚結構。由墓道（未清理）、甬道（ $2.5 \times 0.9 + 1.3$ 公尺）和委角、四壁微外弧的墓室（ $2.85 \times 3.32 + 1.0$ 公尺）所構成，棺床設於南壁。清理時隨葬遺物部分擾亂，但從平面圖仍可得知大致的陳設位置（圖 13）。即：南道東西兩側龕內置帶獅形帽的帶座武士俑（編號 1、2，高 51 公分），墓室最前端近甬道處東西兩側擺放鎮墓獸（編號 3、4），鎮墓獸後方，面向室左方（即西邊）陳放女人面鳥身俑，右方（即東邊）置男人面鳥身俑（同圖 1）。從陳放位置看來，人面鳥身俑應是具有鎮墓護衛的功能的神煞類。另外，同省清河縣咸亨元年（670）孫建墓（圖 14）的人面鳥也是陳放在墓室入口處陶武士俑（編號 1、2）、鎮墓獸（編號 3、4）鄰近之處（編號 15）。定縣南關唐墓出土的人面鳥俑是置放在墓室所砌墓主棺床外，床東側陳放男人面鳥身俑，西側置女人面鳥身俑，但伴出的一對鎮墓獸仍然是置放在甬道。據此或可推測，護衛墓室的任務主要仍是由俗稱的鎮墓獸和武士俑擔綱，人面鳥身俑雖亦具神煞功能，但似不若鎮墓獸般強而有力，或另有職司，並且可視情況彈性為之？

三、做為區域葬俑的陶人面鳥

本文所謂區域葬俑包含兩個層面，其一是因區域的不同而出現的造型差異，也就是大家熟悉的區域樣式的問題，再來則是區域性消費，指的是某類型陶俑是侷限在特定幾個地區的消費品。以下，就以區域的觀點談談陶人面鳥的幾個問題。

從目前的考古資料看來，隋唐時期陶人面鳥也就是「千秋」、「萬歲」的消費區域，其實只是侷限在遼寧省、河北省、河南省、江蘇省、安徽省、湖北省、湖南省和四川省等少數幾個區域，未見於其他省區。其次，若結合陶人面鳥的造型特色，則可以歸結出三個中心區。

（一）是以河北省為中心的區域。除了少數例子如清河縣丘家那唐咸亨元年（670）孫建墓所出釉陶人面鳥造型是呈蹲臥狀匍伏仰首於臺座之上，經公布絕大多數陶人面鳥均著開領長衣，雙手作揖拱於胸前，站立於平臺上，男人面者面龐豐腴、蓄鬚，女人面者頭上有雙髻，鳥喙。同省定縣（圖 15）、安國市（圖 16），邱縣光宅元年（684）袁翼夫婦墓（圖 17）、元氏縣唐垂拱四年（688）呂衆夫婦合葬墓、獻縣或南和縣垂拱四年（688）郭祥夫婦墓都出土了此一類型的陶人面鳥

身俑。值得一提的是，相近造型的成對陶人面鳥身俑還見於鄰近河北省的河南省北部安陽地區唐上元二年（675）楊偁夫婦墓（圖 18）、鞏義二紙廠墓（M1）（圖 19），以及遼寧省近河北省的朝陽地區唐墓（圖 20、21）。

（二）湖南省岳陽、長沙即以唐代岳州、潭州為中心區的唐墓出土品。所見人面帶翼俑，多以一件雙肢和另一件四足帶翅獸成對出現，均不著服，細部造型不盡相同。其中，長沙牛角塘唐墓所出的一件是將腹部貼於平板，抬頭仰胸，雙肢向上反蹠，另一件則有四足，蹲坐在平板上，後者造型與其說是鳥類，其實更像是四足帶翼獸（圖 22）。另外，岳陽市桃花山唐墓（M4）的人面帶翼俑原施青瓷釉，但多已剝落，一件呈雙肢匍伏仰胸狀，帶尾翼（圖 23），另一件呈人面螺髮，四足站立狀（圖 24），發掘報告書認為墓葬結構和當地隋大業年（605-616）相近故屬初唐墓。關於這點，由於長沙咸嘉湖唐墓也出土了和桃花山唐墓（M4）人面鳥（同圖 23）造型一致的青釉俑，而該墓所出盤口壺或燭臺等陶瓷亦和隋墓所見極似，但另件出鑄造於武德年間（618-626）「開元通寶」銅錢，⁹ 推測應屬初唐墓。四川萬縣唐貞觀五年（631）冉仁才墓曾遭盜掘，但也出土了一件青釉人面鳥（圖 25），¹⁰ 造型與前引岳陽市墓（M4）（同圖 23）和咸嘉湖墓等兩座初唐墓相近。

（三）是湖北省武昌郊區隋唐墓出土品。據報告者權奎山的記述，1950 年代所發掘的百餘座隋唐墓葬中計有五十餘座墓出土了陶俑，每墓少者一件，多者六十餘件。之後同氏針對這批陶俑進行整理並予分類和分期於 2012 年公諸於世。權氏以群為單位將陶俑區分為甲至丁等四群，而陶人面鳥即其分類中的「小鎮墓獸」，只見於甲、乙、丙群，由於湖北地區迄今未見陶人面鳥的出土報導，資料難得，茲轉引如下。（引號內為原文）

（三）之甲群

分二式。I 式，「獸身者作蹲踞狀，姿勢較高，身材瘦長」；「鳥身者作站立狀，身材較瘦」（圖 26）。II 式，「僅有鳥身者，作蹲伏狀，姿勢較 I 式低，身材較其胖」（圖 27）；「年代應為唐高宗、武則天時期，即公

9 湖南省博物館（熊傳新等），〈湖南長沙咸嘉湖唐墓發掘簡報〉，《考古》，1980 年 6 期，圖版陸之 3。

10 一說認為四川萬縣唐墓出土的青釉人面鳥乃《雲笈七籤·西王母傳》所載「人面鳥身」的「九天玄女」，見張勛燎等，《中國道教考古》（北京：線裝書店，2006），卷 4，頁 1006。因無證據，本文對此不予採信。

元 650-704 年」。¹¹

（三）之乙群

分三式。I 式，「獸身雙翼者作站狀；鳥身者，作伏臥狀」（圖 28）。II 式，「獸身雙翼者，作坐狀；鳥身者，作伏臥狀。身材較 I 式長瘦」（圖 29）。III 式，「均作伏臥狀。身材較 II 式長瘦」（圖 30）。本群中的第一組（同圖 27）「年代應是高宗時期，即公元 650-684 年」；第二組（同圖 29、30）「年代約在武則天時期，即公元 684-704 年」。¹²

（三）之丙群

「出者，每墓二件。一鳥身獸面，一鳥身人面，作伏臥狀。身材較短胖，尾較長大」（圖 31）。「年代約在唐中宗至玄宗開元時期，即 705-741 年。可下延及唐玄宗天寶初年」。¹³

除了以上所梳理以河北省、湖南省（岳陽、長沙）、湖北省（武昌地區）等為中心的區域唐墓出土陶人面鳥之外，江蘇省北部銅山縣兩座隋墓也出土了陶人面鳥。其中一號墓（M1）伴出了「大隋故石光祿大夫貝州使君鄭公之銘」墓誌蓋，所出女人面鳥呈人形之姿，頭上梳髻，頸下有披肩，翅膀合於背脊（圖 32a）；男人面鳥俑頭戴冠，著寬袖圓領衣，雙手拱於胸前，尾拖曳到地（圖 32b）。另外，同時發掘的另一座隋墓（M2），破壞嚴重，但也出土了一件造型和一號墓相同的陶男人面鳥。

蘇北地區隋唐墓出土的陶人面鳥俑造型極具地方特色，除了上引銅山縣隋墓之外，徐州市花馬莊一座唐墓也出土了類似造型的男女成對的陶人面鳥俑（圖 33）。該墓已遭盜掘，但墓中標本包括幾片施三彩鉛釉的武士俑腳部殘片。由於唐三彩人物俑目前最早見於洛陽武則天期垂拱三年（687）王雄誕夫人魏氏墓，¹⁴ 估計伴出三彩武士俑殘件的徐州市花馬莊唐墓的相對年代應該也不會早於七世紀八十年

11 權奎山，〈武昌郊區隋唐墓出土陶俑的分期〉，收入中國考古學會、瀋陽市文物考古研究所編，《慶祝宿白先生九十華誕文集》，北京：科學出版社，2012，頁 215。

12 權奎山，〈武昌郊區隋唐墓出土陶俑的分期〉，頁 226。

13 權奎山，〈武昌郊區隋唐墓出土陶俑的分期〉，頁 231。

14 洛陽市文物考古研究院（陳誼等），〈洛陽唐代王雄誕夫人魏氏墓發掘簡報〉，《華夏考古》，2018 年 3 期，頁 15-29。洛陽市文物考古研究院編，《唐·王雄誕夫人魏氏墓》（鄭州：中州古籍出版社，2016）。

代，因此可以設想蘇北地區陶人面鳥俑晚迄則天武后期仍然保留著隋代的造型作風，並和前引安徽合肥隋墓陶人面鳥（同圖 2），分別呈現了各自的區域特色。

四、產地

以下試依本文所歸納的河北、湖南和湖北等三個省區，談談陶人面鳥的產地問題。

先談河北省區。其實，伴出有陶人面鳥的墓葬考古報告當中，有的業已指明出土陶俑的產地。如邱縣光宅元年（684）袁翼夫婦墓（圖 17）、南和縣垂拱四年（688）郭祥夫婦墓、元氏縣垂拱四年（688）呂衆夫婦墓，以及邢臺威縣後郭固墓報告書等均指出土墓葬陶俑是來自同省邢窯製品，可惜多未提示確實的考古證據。相對而言，小林仁既仔細觀察了陶俑的造型和胎質特徵，並且援引了 1980 年代公佈的邢窯窯址出土一件陶人面鳥標本（圖 34）指出河北南河縣郭祥夫婦墓（688）（同圖 1）、東賈郭墓、元氏縣呂衆夫婦墓（688）、河南省安陽楊侃墓（675）（同圖 18）以及遼寧省朝陽黃河路（M1）等唐墓出土的同式陶人面鳥應屬邢窯製品。¹⁵ 本文同意這個看法，但另想提示的是，1990 年代內丘縣交通局家屬樓區發現的邢窯遺跡也出土了報告書認為是「人面鳥吻」，但實則是陶女人面鳥頭部殘件（圖 35），其胎色偏紅，質地堅硬，據此可再次確認前引郭祥夫婦墓（688）（同圖 1），以及遼寧省朝陽黃河路唐墓（M1）（同圖 21）等出土的高溫硬質紅陶女人面鳥確實就是邢窯所產。其次，從郭祥夫婦墓（688）、呂衆夫婦墓（688）等紀年墓出土標本可知，邢窯燒造此式陶人面鳥的時代是集中在初唐七世紀後半期。

另一方面，做為盛唐三彩鉛釉陶著名窯場之一的河南省鞏縣窯附近鞏義二紙廠唐墓（M1）亦曾出土陶女人面鳥頭部殘件（同圖 19），其頭梳單髻，額頭和雙耳上方飾菊瓣紋等細部特徵未見於公布的河北地區出土例，報告書認為儘管該墓陶人面鳥等陶神煞俑的組合於同省屬孤例，但仍可從質地判明是鞏義地區製品。從報告書揭示的圖版看來，該墓伴出的包括人面鳥頭部標本等在內陶俑，似屬低溫燒成、胎色偏白的軟陶，其與邢窯所燒造的近於磚胎的高溫陶人面鳥有別，但

15 小林仁，〈唐代邢窯における俑の生産とその流通に関する諸問題〉，收入同氏，《中国南北朝隋唐陶俑の研究》（京都：思文閣，2015），頁 313-338，中譯載北京藝術博物館編，《中國邢窯》（北京：華僑出版社，2012），頁 318-326。

和鞏義唐墓頻見的唐俑胎質大體一致，本文因此傾向同意報告書的產地推定。其次，我們亦需留意，邢窯燒造陪葬用之包括人面鳥在內陶俑的類型不只一種，如裴亞靜等所介紹的一件素陶加彩人面鳥造型就不同於前引墓葬出土或邢窯窯址報導的標本（圖 36）。另外，河北省清河縣丘家那唐咸亨元年（670）孫建墓伴出的是蹲臥於長方版形臺座之上，陶質但有施釉（同圖 14），過去小林仁曾提示該釉陶人面鳥的產地到底是在邢窯還是由河南省所輸入？還有待檢討。¹⁶ 關於這點，個人認為產地判斷或許還應考慮河南省唐墓極少伴出陶人面鳥，少數案例如前引鞏義二紙廠唐墓標本（同圖 19）有可能屬鞏義當地製品，但北部安陽楊侃墓（同圖 18）所見者卻又屬邢窯製品。總之，目前仍無足夠資料得以釐清邢窯燒製陶人面鳥的造型種類，也無法判明河北省區其他窯址燒造製品的具體面貌，至於鞏義窯窯址至今也未見陶人面鳥標本的正式報導。

湖南省唐墓的人面鳥以質地而言，可區分為素陶俑和施罩青釉的青瓷俑等兩類。前者如長沙黃土嶺或長沙牛角塘唐墓標本（同圖 22），後者如長沙咸嘉湖岳陽桃花山墓出土品（同圖 23、24）。從造型所呈現的區域性看來，無論是素燒陶或施釉的人面鳥應該都是當地的製品，不過相對於素燒俑的具體窯場目前不明，施罩青釉的人面鳥之胎釉特徵均和同省湘陰岳州窯青瓷標本一致，知其是來自岳州窯所燒製，此已為相關的墓葬發掘報告書所提及，本文不再贅述。另外，筆者也同意四川省萬縣唐冉仁才墓的報告書執筆將該墓伴出的青瓷人面鳥（同圖 25）比定為是由湖南省岳州窯所輸入的看法。本文可以補充的是，唐貞觀五年（631）歸葬萬州南浦（今萬縣）的冉仁才墓青瓷人面鳥造型既和岳陽桃花山墓（同圖 23、24）相近，其伴出的女樂俑、馬、駝等青釉俑也和長沙咸嘉湖出土俑類同，此不僅可說明冉仁才墓青瓷俑來自岳州窯，更意謂著前引湖南省伴出同類青瓷俑唐墓的相對年代也應該在七世紀前半的唐初時期。結合出土素燒人面鳥的長沙黃土嶺等唐墓的年代也被報告書定在初唐期，可知湖南省區流行以陶瓷人面鳥入墓陪葬的年代似乎多在七世紀前半。與此相關的是，1960 年代報導出土有陶人面鳥的長沙三、四號墓這兩座當時被定為南朝末期至隋唐之際墓的年代，也已由權奎山將之修正在七世紀前半期。¹⁷

16 小林仁，〈唐代邢窯における俑の生産とその流通に関する諸問題〉，頁 317。

17 權奎山，〈中國南方隋唐墓的分區分期〉，《考古學報》，1992 年 2 期，頁 156-158。

湖北省武昌地區出土陶瓷人面鳥當中也包括來自湖南省岳州窯的青瓷製品，如前述權奎山所分類的乙群即包括岳州窯青瓷在內。相對的，甲群和丙群的燒造地點目前仍未能確認，權氏認為甲群陶俑器形和胎質未見於武昌以外其他地區，故應是當地所燒造的；而丙群陶俑的種類、組合以及胎質均和江蘇省揚州唐墓所出者一致，可能是來自揚州及附近地區。¹⁸ 個人認為，由於相關窯場未能發現，權氏在並未列舉揚州考古出土例的情況之下所做的產地推測目前不易實證，僅記於此待將來檢證。

五、唐俑販路——凶肆的物流

唐代陶俑跨區域流通並非新聞，如地處鄱陽湖畔的江西省永修縣唐墓出土的三彩鎮墓獸，以及駱駝、人物等釉陶的造型和胎釉就和河南省洛陽等地唐墓出土品一致，應是由河南省所攜入。¹⁹

就本文的議題而言，唐代陶人面鳥的消費地大致集中在今河北省、湖南省和湖北省等三省區。其中湖南省（岳陽、長沙）青釉製品多來自當地岳州窯，而湖北省（武昌）既見由湖南岳州窯輸入的青釉人面鳥，也包括了武昌當地以及推測是由江蘇省揚州輸入但仍待確認的陶製品。至於以河北省為中心的陶人面鳥產地並非單一，但有不少是來自同省著名邢窯所燒造。儘管已公布的邢窯窯址標本仍然有限且集中在白瓷製品，但基本上已可識別出邢窯製品當中的一類銷路最廣、最為喪家所接納的陶人面鳥樣式特徵。以下即以邢窯此一類型陶人面鳥為例，引申談談唐俑從生產作坊到消費場域的物流情況。

從已公布的墓葬出土例看來，邢窯此類型陶人面鳥集中出現在以邢窯窯址所在地內丘、臨城為中心的河北省南部區，如定縣南關（同圖 15）、安國市梨園、獻縣、元氏縣、邢臺威縣、南和縣東賈郭、南和縣郭祥墓（688，同圖 1），和河南省北部呂眾墓（688）以及鄰近河北省的河南省安陽楊侃夫婦墓（675，同圖 18）都有出土。另外，遼寧省朝陽市黃河路一號墓（M1）亦見此類型陶人面鳥（同圖

18 權奎山，〈武昌郊區隋唐墓出土陶俑的分期〉，頁 241-242。

19 許智範，〈鄱陽湖畔發現一批唐三彩〉，《文物天地》，1987 年 4 期，頁 18；產地比定可參見：謝明良，《中國鉛釉陶的世界——從戰國到唐代》（臺北：石頭出版股份有限公司，2014），頁 125-126。

20、21)，未遭盜擾的墓葬所出者多一男面一女面組合成對。值得一提的是，朝陽黃河路墓（M1）不僅可見邢窯陶人面鳥標本，小林仁還觀察到其同時也伴出了河南省窯區所燒造的黃釉騎馬樂俑頭部殘件，²⁰ 是一墓同出兩個外省區所製造陪葬陶俑的珍貴案例。

雖然遼寧省朝陽地區唐墓出土來自河北省邢窯素燒俑或河南省釉陶俑並不少見，不過朝陽市雙塔區唐永徽三年（652）上柱國雲麾將軍楊和墓的案例應該特別予以留意。從該墓伴出的釉陶侍俑或儀仗俑的造型看來，²¹ 其和河南省孟津縣唐墓（C10M821）等河南省境內諸多唐墓所出一致，²² 可以輕易推測其應是來自河南窯區的製品。問題是，從墓誌可知楊和以永徽三年（652）四月十九日薨於私第，春秋八十有四，並在同年同月二十七入葬，²³ 也就是說從亡故到埋葬的時間前後僅只九天。當地的學者也察覺到此一現象，故而主張楊和墓陶俑是使用了當地前人葬儀過後所留下的剩餘物件。²⁴ 但我認為應該將此一情況置於凶肆的物流脈絡來予以觀察，如此才可理解各省區或者說唐代諸道、州會普遍出現其他區域陪葬陶俑的現象。

中國很早就有販售棺木、斂具的專門店舖。迄北魏《洛陽伽藍記》卷四載「市北有慈孝，奉終二里，里內之人以賣棺槨為業，賃輜車為事」，是群聚以葬儀為業的街區。在唐代被稱為凶肆的葬儀店舖所經手的業務除了租售載棺的靈柩車（輜車）、柩車的引繩、車前旗（纛）、帷帳（總帷）也提供專業的挽歌手，和方相等和葬儀有關的各種物件和隨葬物，另從唐晚期白行簡《李娃傳》所描述的長安凶肆可知，當時已存在邦頭（長、師）、耆舊、成員（同黨）組織，韋述《兩京新記》（成書於722年）也記載了街西延平門豐邑坊凶肆經營葬儀用具的情況，²⁵ 而1970年代發掘長安城西市西大街遺址在現代修掘窖穴積土中所發現的唐代後期殘

20 小林仁，〈唐代邢窯における俑の生産とその流通に関する諸問題〉，頁319。

21 遼寧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萬雄飛等），〈朝陽唐楊和墓出土文物簡報〉，收入《朝陽隋唐墓葬發現與研究》（北京：科學出版社，2012），頁3-6及圖版1~2。

22 洛陽市文物工作隊（方莉等），〈洛陽孟津朝陽送莊唐墓簡報〉，《中原文物》，2007年6期，頁10-16。

23 萬雄飛等，〈唐楊和墓志考〉，收入《朝陽隋唐墓葬發現與研究》，頁189-195。

24 郭明，〈淺析朝陽唐墓出土的俑〉，收入中國考古學會編，《中國考古學會第十六年會論文集2013》（北京：文物出版社，2016），頁304。

25 妹尾達彦，〈唐代後半期の長安と伝奇小説——《李娃伝》の分析を中心として〉，收入日野開三郎博士頌壽記念論集刊行會編，《日野開三郎博士頌壽記念論集：中国社会・制度・文化史の諸問題》（福岡：中國書店，1987），頁489-490。

陶俑和陶俑頭部，更被認為即「凶肆」的遺跡。²⁶ 相對於人口已達百萬的唐長安城內豐邑坊和西市的凶肆，做為隋唐時期營州的治所柳城所在地的朝陽城區當然也存在租售葬儀殮具的專業店舖即凶肆。如果說，凶肆內所陳列展示供喪家挑揀的各種檔次價位陶俑什具當中，包括了由其他道、州所輸入的物貨無寧是極為自然的事，也因此才會出現朝陽黃河路一號墓（M1）般既出土河北邢窯陶人面鳥，同時伴出河南窯區的釉陶樂俑。

依據嚴耕望先生所梳理唐代的「渝關通柳城契丹遼東道」，自幽州（北京區）往東經潞縣、三河縣至薊州治所漁陽縣（今薊縣）需二百三十里，再往東經玉田縣、石城縣、平州治所盧龍縣達臨渝關（山海關）需約五百里，而後往東北赴營州治所柳城縣（今朝陽）需四百八十里，也就是說光是從北京地區赴朝陽里程就需約一千兩百里（約 648 公里）。²⁷ 這樣看來，前述自亡故到入葬前後不過九天的朝陽市楊和墓出土的河南窯區釉陶俑，只能想像是就近在朝陽城鎮的凶肆所購得的輸入物件。就此而言，討論區域陶俑消費時實有必要慎重考慮凶肆物流所可能產生的作用。雖然地方葬俗和喪家的好惡是決定凶肆販售物件種類的關鍵，但地方上的凶肆經營者在不違背區域葬俗的前提之下對於陶俑等明器的輸入和種類選擇，或許也是促使該地區墓葬陶俑規格多樣化，反之限縮造成陶俑種類單一化的要素之一。個人認為，朝陽地區唐墓屢次出現河北邢窯素燒俑和河南釉陶俑一事，也應納入凶肆物流的脈絡中來予以理解。另外，《大唐六典》載甄官署執掌業務時提及「凡喪葬則供其明器之屬」，原註「別敕葬者供餘並私備」，想來喪家私備的明器就是購自凶肆；但凶肆經營者有時亦需承擔連帶風險，即喪家逾制買入不符身分規格明器時，朝廷「先罪供進行人賈售之罪，庶其明器，竝用瓦木。永無僭差。」（《唐會要》卷三八·葬），²⁸ 營利的同時往往還需拿捏分寸。

六、餘談

帶有榜題的「千秋」、「萬歲」圖像最早見於朝鮮平壤高句麗永樂十八年（409）德興里古墳壁畫（同圖 4），這類圖像一說可上溯中國河北省洛陽東漢卜

26 宿白，〈隋唐長安城和洛陽城〉，《考古》，1978 年 6 期，頁 418-419。

27 嚴耕望，《唐代交通圖考》（臺北：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1986），卷 5，頁 1745-1772。

28 謝明良，〈對唐三彩與甄官署關係的一點意見〉，收入同氏，《陶瓷手記 3：陶瓷史的地平與想像》（臺北：石頭出版股份有限公司，2015），頁 238。

千秋墓壁畫上的女人面鳥身像和豬頭人身像（同圖 5），迄六世紀河南鄧縣畫像磚「千秋」呈人面鳥身，「萬歲」呈獸首鳥身（同圖 3），除了洛陽北魏墓誌邊飾（同圖 8），河北鄴城地區北齊墓也頻仍以人面鳥身「千秋」、「萬歲」做為壁畫的裝飾母題或墓磚裝飾圖紋（同圖 9、10、11）。陶塑的「千秋」、「萬歲」俑也就是本文所稱的人面鳥俑之早期例見於江蘇北部和安徽中部隋墓，其造型一呈女面，一呈男面，進入到唐代陶人面鳥明顯集中分布在河北省、湖南省、湖北省等三省及鄰近地區。以紀年墓或可判明相對年代的墓葬出土例而言，河北省或毗鄰的遼寧省朝陽墓、河南省安陽墓的年代多集中在初唐七世紀後半期，但湖南省或毗鄰的四川省萬縣墓以及湖北省武昌地區則多見於初唐七世紀前半期墓。依據以上考古實例，可以看出壁畫或墓誌畫像磚的人面鳥圖像似乎是隨著時代而漸轉化成立體的陶塑布置在墓室空間。相對於學者已曾指出湖南省西漢馬王堆三號墓是以懸在棺室壁面帛畫中的侍從圖像來表現遣冊所載入墓的木俑，即馬王堆漢墓是以所謂「帛畫俑」取代了雕刻的墓俑，²⁹ 本文的案例則提示了隋唐時期陶人面鳥俑乃是自平面的「千秋」、「萬歲」畫像出走成了墓室的陪葬俑類。墓室壁面圖像和室內明器俑類的可替代性，值得再予留意。

從唐墓出土陶俑等明器的造型種類看來，可以將唐帝國劃分出幾個內容不同的「明器文化圈」。其中，山西、遼寧、河北及河南中北部等地區因與陝西省存在著相異的喪葬習俗和不同隨葬俑類，從而形成一個有別於陝西省等地區的明器文化圈。³⁰ 經由陶人面鳥的消費出土分布，可以進一步地將該明器文化圈的內涵予以細緻化，並做些必要的修正。如陝西省雖未見陶人面鳥俑，但同省三原縣隋開皇二年（582）李和墓石棺蓋以減地平鍛手法雕刻出的呈對稱排列的兩體男女面人面鳥，極可能即「千秋」和「萬歲」。³¹ 另外如山西省唐墓雖頻見該文化圈中具有特色並且有的是從河北省邢窯所輸入的陶人首魚身俑、雙人首蛇（龍）身俑，卻未見同樣是邢窯所燒造且廣為外銷的陶人面鳥，此說明了同一明器文化圈中仍可因

29 林巳奈夫，《石に刻まれた世界 畫像石が語る古代中国の生活と思想》（東京：東方書店，1992），頁 11-12；劉曉路，〈論帛畫俑：馬王堆三號墓東西壁帛畫的性質和內容〉，《考古》，1995 年 10 期，頁 937-941，以及巫鴻著，施杰譯，《黃泉下的美術》（北京：三聯書店，2010），頁 106。

30 謝明良，〈山西唐墓出土陶瓷初探〉，《藝術學》，1995 年 14 期，後收入謝明良，《中國陶瓷史論集》（臺北：允晨文化，2007），頁 22-23。

31 陝西省文物管理委員會（王玉清），〈陝西省三原縣雙盛村隋李和墓清理簡報〉，《文物》，1966 年 1 期，頁 32 及圖 39。

區域的不同而存在著地方特色。汗顏的是，筆者至今仍理不出山西地區人們頑強地抗拒以陶人面鳥隨葬入墓的原因所在。

從造型特徵諸情況看來，本文以上所列舉的隋唐時期各地區出土的陶人面鳥的性質已從東晉《抱朴子》所載「壽如其名」的「千秋」、「萬歲」長壽祥瑞漸趨成了墓葬的神煞俑類，特別是安徽省合肥隋開皇六年（586）墓（同圖 12）或河北省唐垂拱四年（688）郭祥夫婦墓陶人面鳥在墓室的陳放位置（同圖 13）更是表明其具有鎮墓或辟邪的功能。

另一方面，中國境內所見粟特人墓亦屢見人面鳥身圖像，如陝西省西安北周大象元年（579）安伽墓室門楣所見祭壇兩側戴著口罩（Padām）的人面鳥身祭司即為一例（圖 37）。姜伯勤曾經提到《抱朴子》「千秋之鳥，萬歲之鳥」的壽亦如其名的長壽人面鳥身，正巧和貝利（H. W. Bailey）所指出做為中古波斯福壽之鳥的赫瓦雷納（Xvarenah）字義中所蘊含的「福運」偶合。³² 田邊勝美也曾援引葛樂耐（F. Grenet）所說鳥人形異獸乃是瑣羅亞斯德教 Dahma Afriti 神的說法，而 L. H. Gray 又將此神祇視為「祝福」之神格化（Dahma = Pious），進而推測中國粟特人墓葬的人首鳥身圖像有祝福死者靈魂復甦，祈願極樂往生之意。³³ 巧合的是，私人藏的一件唐代邢窯女人面鳥背脊可見「吉利」墨書（圖 38），該陶人面鳥雖非考古發掘遺物，但從胎表看來，「吉利」墨書似非出土後所書寫。另外，寓意福壽、吉祥的「吉利」鳥在唐高宗麟德三年（666）編《天地祥瑞志》亦有記載，如做為《唐六典》中最高品「大瑞」的「吉利」、「富貴」鳥：「有鳥，獐頭足，狀如鳳、名曰吉利鳥，見則吉利也。有鳥，牛頭足，狀如鸛鳥，名曰富貴，見則為富貴也。」；前引德興里古墳前室南壁天井也繪有分別帶「吉利之象」、「富貴之象」榜題的獸頭鳥（圖 39）。松浦史子認為，「吉利」和「富貴」鳥雖是獸頭，但《祥瑞志》中的圖文是和千秋·萬歲一樣，均傳承自《山海經》的人面鳥和獸頭神等

32 姜伯勤，《中國祇教藝術史研究》（北京：三聯書局，2004），頁 101-102。

33 田邊勝美，〈バーミヤーンのいわゆる太陽神像に関する一考察〉，《西アジア考古學》，第 6 號（2005），頁 17。同文引用相關論文如下：Boris Marshak, "La thématique sogdienne l'art de la Chine de la seconde moitié du Vie Siècle," *Comptes rendus de l'Académie des Inscriptions & Belle-Lettres* 145-1 (2001): 244; Louis H. Gray, "The Foundations of the Iranian Religions," *The Journal of the K. R. Cama Oriental Institute* 15 (1929): 130-131. 近年黎北嵐（Pénélope Riboud）則強調此鳥（鸛）形祭司是職司引魂兼職戰鬥的斯勞沙（Srōsh）神。見：〈鳥形祭司中的這些祭司是什麼？〉，收入榮新江等編，《粟特人在中國》（北京：科學出版社，2016），冊下，頁 396-413。

神祇。³⁴ 僅就圖像而言，河南鄧縣畫像磚所見「萬歲」雖呈獸頭鳥身（同圖 3），但本文所列舉的隋唐墓出土者均呈人面，湖南岳陽唐墓出土的呈四足獸形者亦為人首（同圖 24）；中古中國粟特人葬具圖像中的人面鳥祭司均為男面，其和多呈一女面一男面的千秋·萬歲人面鳥有別。看來隋唐墓陶人面鳥既不同於中古波斯的人首鳥身祭司，也和做為祥瑞的吉利、富貴鳥無涉。

34 松浦史子，〈關於獸頭鳳凰「吉利、富貴」——翱翔於亂世的吉鳥〉，《中國文哲研究通訊》，28 卷 3 期（2018.9），頁 14；同氏，〈獸頭の吉鳳「吉利、富貴」について——日中韓の祥瑞情報を手がかりに〉，《アジア遊學》，第 244 號（2020），頁 111-125。

引用書目

近代論著

- 王去非，〈隋墓出土的陶千秋萬歲及其他〉，《考古》，1979年3期，頁275-276。
- 王銘，〈唐宋墓葬中的千秋萬歲鳥與觀風鳥不同形象辨析、歷史來源及象徵意義〉，《江漢考古》，2014年1期，頁94-101。
- 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等，《磁縣灣漳北朝壁畫墓》，北京：科學出版社，2003。
- 朱岩石，〈「千秋萬歲」圖像源流淺識〉，收入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漢唐與邊疆考古研究編委會編，《漢唐與邊疆考古研究》，第1輯，北京：科學出版社，1994，頁131-135。
- 巫鴻著，施杰譯，《黃泉下的美術》，北京：三聯書店，2010。
- 林聖智，《圖像與裝飾：北朝墓葬的生死表象》，臺北：臺大出版中心，2019。
- 姜伯勤，《中國祆教藝術史研究》，北京：三聯書局，2004。
- 洛陽市文物工作隊（方莉等），〈洛陽孟津朝陽送莊唐墓簡報〉，《中原文物》，2007年6期，頁10-16。
- 洛陽市文物考古研究院（陳誼等），〈洛陽唐代王雄誕夫人魏氏墓發掘簡報〉，《華夏考古》，2018年3期，頁15-29。
- 洛陽市文物考古研究院編，《唐·王雄誕夫人魏氏墓》，鄭州：中州古籍出版社，2016。
- 孫作雲，〈洛陽西漢卜千秋墓壁畫考釋〉，《文物》，1977年6期，頁17-22。
- 徐蘋芳，〈唐宋墓葬中的「明器神煞」與「墓儀」制度——讀《大漢原陵秘葬經》札記〉，《考古》，1963年2期，頁87-106。
- 耿超，〈唐宋墓葬中的觀風鳥研究〉，《華夏考古》，2010年2期，頁112-119。
- 耿超，〈淺議觀風鳥在墓葬中的作用〉，《文博》，2007年5期，頁44-47。
- 耿超，〈觀風鳥源流研究〉，《文物春秋》，2007年1期，頁38-44。
- 陝西省文物管理委員會（王玉清），〈陝西省三原縣雙盛村隋李和墓清理簡報〉，《文物》，1966年1期，頁27-42。
- 宿白，〈隋唐長安城和洛陽城〉，《考古》，1978年6期，頁409-425+401。
- 張勛燎等，《中國道教考古》，第4卷，北京：線裝書店，2006。
- 許智範，〈鄱陽湖畔發現一批唐三彩〉，《文物天地》，1987年4期，頁18。
- 郭明，〈淺析朝陽唐墓出土的俑〉，收入中國考古學會編，《中國考古學會第十六年會論文集2013》，北京：文物出版社，2016，頁300-309。
- 湖南省博物館（熊傳新等），〈湖南長沙咸嘉湖唐墓發掘簡報〉，《考古》，1980年6期，頁506-511。

- 萬雄飛等，〈唐楊和墓志考〉，收入《朝陽隋唐墓葬發現與研究》，北京：科學出版社，2012，頁 189-195。
- 劉曉路，〈論帛畫俑：馬王堆三號墓東西壁帛畫的性質和內容〉，《考古》，1995 年 10 期，頁 937-941。
- 黎北嵐（Pénélope Riboud），〈鳥形祭司中的這些祭司是什麼？〉，收入榮新江等編，《粟特人在中國》，冊下，北京：科學出版社，2016，頁 396-413。
- 遼寧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萬雄飛等），〈朝陽唐楊和墓出土文物簡報〉，收入《朝陽隋唐墓葬發現與研究》，北京：科學出版社，2012，頁 3-6。
- 閻焯主編，《盛世和平：「一帶一路」下的唐代文物》，南寧：廣西美術出版社，2017。
- 謝明良，〈山西唐墓出土陶瓷初探〉，《藝術學》，1995 年 14 期，頁 47-76；後收入謝明良，《中國陶瓷史論集》，臺北：允晨文化，2007，頁 5-34。
- 謝明良，〈對唐三彩與甄官署關係的一點意見〉，收入謝明良，《陶瓷手記 3：陶瓷史的地平與想像》，臺北：石頭出版股份有限公司，2015，頁 235-238。
- 謝明良，《中國鉛釉陶的世界——從戰國到唐代》，臺北：石頭出版股份有限公司，2014。
- 謝曉燕，〈中國古代的「千秋萬歲」瓦當與「人面鳥身」圖像〉，《中國社會科學報》，2009 年 10 月 29 日第 5 版，<https://www.chinafolklore.org/web/index.php?NewsID=6258>，檢索日期：2020 年 10 月 23 日。
- 嚴耕望，《唐代交通圖考》，臺北：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1986。
- 權奎山，〈中國南方隋唐墓的分區分期〉，《考古學報》，1992 年 2 期，頁 147-184。
- 權奎山，〈武昌郊區隋唐墓出土陶俑的分期〉，收入中國考古學會、瀋陽市文物考古研究所編，《慶祝宿白先生九十華誕文集》，北京：科學出版社，2012，頁 202-244。
- 小林仁，〈唐代邢窯における俑の生産とその流通に関する諸問題〉，收入小林仁，《中国南北朝隋唐陶俑の研究》，京都：思文閣，2015，頁 313-338，中譯載北京藝術博物館編，《中國邢窯》，北京：華僑出版社，2012，頁 318-326。
- 田辺勝美，〈パーミヤーンのいわゆる太陽神像に関する一考察〉，《西アジア考古學》，第 6 號，2005 年，頁 15-28。
- 林巳奈夫，〈洛陽ト千秋壁画に対する注釋〉，收入林巳奈夫，《漢代の神神》，京都：臨川書店，1989，頁 281-317。
- 林巳奈夫，《石に刻まれた世界 畫像石が語る古代中国の生活と思想》，東京：東方書店，1992。
- 松浦史子，〈關於獸頭鳳凰「吉利、富貴」——翱翔於亂世的吉鳥〉，《中國文哲研究通訊》，28 卷 3 期，2018 年 9 月，頁 1-27。
- 松浦史子，〈獸頭的吉鳳「吉利、富貴」について——日中韓の祥瑞情報を手がかりに〉，《アジア遊學》，第 244 號，2020 年，頁 111-125。

妹尾達彦，〈唐代後半期の長安と伝奇小説——《李娃伝》の分析を中心として〉，收入日野開三郎博士頌壽記念論集刊行會編，『日野開三郎博士頌壽記念論集：中国社会・制度・文化史の諸問題』，福岡：中國書店，1987，頁 476-505。

Gray, Louis H. “The Foundations of the Iranian Religions,” *The Journal of the K. R. Cama Oriental Institute* 15 (1929): 130-131.

Marshak, Boris. “La thématique sogdienne l’art de la Chine de la seconde moitié du Vie Siècle.” *Comptes rendus de l’Académie des Inscriptions & Belle-Lettres* 145-1 (2001): 227-264.

圖版出處

- 圖 1 a 中國河北省唐垂拱四年郭祥夫婦墓出土陶人面鳥；b 中國河北省唐垂拱四年郭祥夫婦墓出土陶人面鳥。圖版取自辛明偉、李振奇，〈河北南和唐代郭祥墓〉，《文物》，1993 年 6 期，頁 24，圖 19、20。
- 圖 2 a 中國安徽省隋開皇六年墓出土陶人面鳥；b 中國安徽省隋開皇六年墓出土陶人面鳥。圖版取自辛明偉。圖版取自安徽省展覽、博物館（胡悅謙），〈合肥西郊隋墓〉，《考古》，1976 年 2 期，圖 11 之 3、4。
- 圖 3 中國河南省鄧縣南朝墓採集千秋萬歲彩色畫像磚。圖版取自河南省文化局文物工作隊，〈鄧縣彩色畫象磚墓〉，北九州：北九州中國書店，1981，頁 9。
- 圖 4a 北韓平安南道德興里高句麗永樂十八年古墳天井「千秋之象」、「萬歲之象」榜題人面鳥。圖版取自松浦史子，〈關於獸頭鳳凰「吉利・富貴」——翱翔於亂世的吉鳥〉，《中國文哲研究通訊》，28 卷 3 期，2018 年 9 月，頁 25，圖 9。
- 圖 4b 北韓平安南道德興里高句麗永樂十八年古墳天井「千秋之象」、「萬歲之象」榜題人面鳥線繪圖。圖版取自菊竹淳一、吉田宏志，《世界美術大全集東洋編・10・高句麗・百濟・新羅・高麗》，東京：小學館，1998，頁 74，圖 40。
- 圖 5a 中國河南省洛陽西漢卜千秋墓壁畫人面鳥身像。圖版取自林巳奈夫，〈洛陽卜千秋壁畫に対する注釋〉，《漢代の神神》，京都：臨川書店，1989，頁 299，圖 15。
- 圖 5b 中國河南省洛陽西漢卜千秋墓壁畫豬頭人身像。圖版取自洛陽博物館（黃明蘭），〈洛陽西漢卜千秋墓壁畫發掘簡報〉，《文物》，1977 年 6 期，圖 1。
- 圖 6 a 中國江蘇省東晉隆安二年墓出土畫像磚獸首鳥身；b 中國江蘇省東晉隆安二年墓出土畫像磚人首鳥身。圖版取自姚遷、古兵編，《六朝藝術》，北京：文物出版社，1981，圖 150、152。
- 圖 7 中國遼寧省朝陽十二臺鄉前燕（88M1）墓出土銅鑲金馬鞍所見人面鳥身像。圖版取自遼寧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張克舉等），〈朝陽十二臺鄉磚廠 88M1 發掘簡報〉，《文物》，1997 年 11 期，頁 28，圖 25。
- 圖 8a 洛陽北魏永安二年（529）荀景墓誌蓋邊所見人面鳥拓本。圖版取自宮川寅雄、伏見沖敬編，《西安碑林書道藝術》（東京：講談社，1979），頁 56，圖 52-55。
- 圖 8b 洛陽北魏永安二年（529）荀景墓誌蓋邊所見人面鳥線繪圖。圖版取自張鴻修編，《北朝石刻藝術》（西安：陝西人民美術出版社，1993），頁 105，圖 77。
- 圖 9 北齊天保八年千秋・萬歲畫像磚線繪圖。圖版取自松浦史子，〈平昌五輪に現れた人面鳥の正体は——「山海經」の異形と中華のキワ〉，《この世のキワ》，東京：勉誠出版，2019，頁 178，圖 5。
- 圖 10 「□齊天保□」年人面鳥畫像磚，鄴城考古隊藏。圖版取自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等，《鄴城文物薈華》，北京：文物出版社，2014，頁 89。

- 圖 11 大魏興和二年千秋·萬歲畫像磚拓本。圖版取自閻焱主編，《盛世和平：「一帶一路」下的唐代文物》，南寧：廣西美術出版社，2017，頁 21。
- 圖 12 中國安徽省隋開皇六年墓平面圖。圖版取自安徽省展覽、博物館（胡悅謙），〈合肥西郊隋墓〉，《考古》，1976 年 2 期，頁 135，圖 1。
- 圖 13 中國河北省唐垂拱四年郭祥夫婦墓平面圖。圖版取自辛明偉、李振奇，〈河北南和唐代郭祥墓〉，《文物》，1993 年 6 期，頁 21，圖 2。
- 圖 14 中國河北省唐咸亨元年孫建墓出土陶人面鳥。圖版取自辛明偉、李振奇，〈河北清河丘家那唐墓〉，《文物》，1990 年 7 期，頁 50，圖 14。
- 圖 15 中國河北省定縣唐墓出土陶人面鳥。圖版取自信立祥，〈定縣南關唐墓發掘簡報〉，《文物資料叢刊》，1982 年 6 期，頁 112，圖 7、8。
- 圖 16 中國河北省安國市唐墓出土陶人面鳥線繪圖。圖版取自河北省文物研究所等（雷建紅等），〈河北省安國市梨園唐墓發掘簡報〉，《文物春秋》，2001 年 3 期，頁 33，圖 11 之 2。
- 圖 17 a 中國河北省邱縣光宅元年袁翼夫婦墓出土陶人面鳥；b 中國河北省邱縣光宅元年袁翼夫婦墓出土陶人面鳥。圖版取自邯鄲市文物保護研究所、邱縣文物保護管理所（劉爽等），〈河北邱縣唐袁翼夫婦墓發掘簡報〉，《文物》，2021 年 3 期，封面圖；頁 14，圖 33；頁 13，圖 31、32。
- 圖 18 中國河南省上元二年楊侃墓出土陶人面鳥。圖版取自安陽市博物館，〈唐楊侃墓清理簡報〉，《文物資料叢刊》，1982 年 6 期，圖 5 之 8。
- 圖 19 a 中國河南省鞏義市二紙廠唐墓（M1）出土陶人面鳥；b 中國河南省鞏義市二紙廠唐墓（M1）出土陶人面鳥線繪圖。圖版取自許昌市博物館、鞏義市博物館（宋奇等），〈河南鞏義二紙廠唐墓發掘簡報〉，《中原文物》，2019 年 3 期，頁 33 圖 5、頁 32 圖 2 之 5。
- 圖 20 中國遼寧省朝陽黃河路唐墓（M1）出土陶人面鳥。圖版取自遼寧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朝陽市博物館（李新全、于俊玉），〈遼寧朝陽市黃河路唐墓的清理〉，《考古》，2001 年 8 期，圖 10 之 6。
- 圖 21 中國遼寧省朝陽黃河路唐墓（M1）出土陶人面鳥線繪圖。圖版取自遼寧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朝陽市博物館（李新全、于俊玉），〈遼寧朝陽市黃河路唐墓的清理〉，《考古》，2001 年 8 期，頁 67，圖 8。
- 圖 22 中國湖南省長沙牛角塘唐墓出土陶人面鳥。圖版取自何介鈞、文道義，〈湖南長沙牛角塘唐墓〉，《考古》，1964 年 12 期，圖 8 之 4。
- 圖 23 中國湖南省岳陽唐墓（M4）出土青釉人面鳥。圖版取自岳陽市文物考古研究所（付淑華），〈湖南岳陽桃花山唐墓〉，《文物》，2006 年 11 期，封三之 3。
- 圖 24 中國湖南省岳陽唐墓（M4）出土青釉人面四足翼獸。圖版取自岳陽市文物考古研究所（付淑華），〈湖南岳陽桃花山唐墓〉，頁 58，圖 32。

- 圖 25 中國四川省唐貞觀五年（631）冉仁才墓出土青釉人面鳥。圖版取自四川省博物館（高英民），〈四川萬縣唐墓〉，《考古學報》，1980 年 4 期，圖 4 之 4。
- 圖 26 中國湖北省武昌唐墓（M161）出土陶人面鳥和人面四足獸。圖版取自中國考古學會、瀋陽市文物考古研究所編，《慶祝宿白先生九十華誕文集》，北京：科學出版社，2012，頁 206，圖 2 之 4、5。
- 圖 27 中國湖北省武昌唐墓（M13）出土陶人面鳥。圖版取自中國考古學會、瀋陽市文物考古研究所編，《慶祝宿白先生九十華誕文集》，北京：科學出版社，2012，頁 206，圖 2 之 7。
- 圖 28 中國湖北省武昌唐墓（M439）出土陶人面鳥。圖版取自中國考古學會、瀋陽市文物考古研究所編，《慶祝宿白先生九十華誕文集》，北京：科學出版社，頁 217，圖 8 之 1、2。
- 圖 29 中國湖北省武昌唐墓（M401）出土陶人面鳥。圖版取自中國考古學會、瀋陽市文物考古研究所編，《慶祝宿白先生九十華誕文集》，北京：科學出版社，頁 217，圖 8 之 4、5。
- 圖 30 中國湖北省武昌唐墓（M434）出土陶人面鳥。圖版取自中國考古學會、瀋陽市文物考古研究所編，《慶祝宿白先生九十華誕文集》，北京：科學出版社，頁 217，圖 8 之 7、8。
- 圖 31 中國湖北省武昌唐墓（M76）出土陶人面鳥和獸面鳥身。圖版取自中國考古學會、瀋陽市文物考古研究所編，《慶祝宿白先生九十華誕文集》，北京：科學出版社，頁 227，圖 13 之 1、4。
- 圖 32 a 中國江蘇省銅川隋墓出土陶女面鳥；b 中國江蘇省銅川隋墓出土陶男面鳥。圖版取自徐州博物館（金澄、武利華），〈江蘇銅山縣茅村隋墓〉，《考古》，1983 年 2 期，圖 8 之 5、7 之 3。
- 圖 33 a 中國江蘇省徐州市唐墓（M2）出土陶女面鳥；b 中國江蘇省徐州市唐墓（M2）出土陶男人面鳥。圖版取自徐州市博物館（盛儲彬、耿建軍），〈江蘇徐州市花馬庄唐墓〉，《考古》，1997 年 3 期，圖 5 之 2、3。
- 圖 34 中國河北省邢窯窯址出土標本。圖版取自內丘縣文物保管所（賈忠敏、賈永祿），〈河北省內丘縣邢窯調查簡報〉，《文物》，1987 年 9 期，圖 1 之 4。
- 圖 35 中國河北省邢窯窯址出土陶女人面鳥頭部標本。圖版取自李恩璋等主編，《邢窯遺址研究》，北京：科學出版社，2007，頁 121，圖 9。
- 圖 36 素陶加彩人面鳥。圖版取自北京藝術博物館編，《中國邢窯》，北京：中國華僑出版社，2012，頁 353，圖 002。
- 圖 37 中國陝西省大象元年安伽墓石門額線繪圖。圖版取自陝西省考古研究所編著，《西安北周安伽墓》，北京：文物出版社，2003，圖 13。

圖 38 a 陶人面鳥，私人藏；b 同 36a 陶人面鳥背面，右邊女人面鳥背有「吉利」墨書。圖版取自 *Kaikodo* 懷古堂，vol. XIX (Spring 2001): 200-201, pl. 60.

圖 39 朝鮮平安南道德興里高句麗永樂十八年古墳天井畫，「吉利之象」榜題獸首鳥身像。圖版取自菊竹淳一、吉田宏志，《世界美術大全集東洋編・10・高句麗・百濟・新羅・高麗》，東京：小學館，1998，頁 29，圖 10。

Human-Head Bird Pottery Figurines Excavated from Sui and Tang Dynasty Tombs

Hsieh, Ming-liang

Graduate Institute of Art History,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Abstract

Pottery figurines having the body of a bird and the head of a human are often found among the funerary objects in Chinese tombs of the Sui and Tang dynasties. The present study examines the distribution of this type of figurine and comes to the conclusion that they generally have been excavated in Hebei, Hunan, and Hubei as well as the surrounding area, representing a regional tomb figurine. Furthermore, judging from the location where human-head bird pottery figurines have been excavated from tombs, it suggests that they may have served the function of protecting the tomb chamber. Considering regional consumer tendencies involving human-head bird pottery figurines may assist scholars in the study of other figurine types for determining several differences in the “cultural circle of funerary goods” within the Tang Empire. Thus, it has considerable reference value for present and future studies of funerary goods culture in the Tang dynasty. In addition, the present study discusses the cross-regional sales channels of human-head bird pottery figurines using the example of Xing ware specimens excavated in Hebei. It is believed that logistics involved in the sale and loan of funerary objects by so-called “funerary shops” was probably a major reason behind the cross-regional spread of tomb pottery figurines.

Keywords: human-head bird, Tang dynasty pottery figurine, cultural circle of funerary goods, funerary shop

(Translated by Donald E. Brix)



圖 1a 陶人面鳥 高 17 公分 中國河北省
唐垂拱四年（688）郭祥夫婦墓出土



圖 1b 陶人面鳥 高 17.5 公分 中國河北省
唐垂拱四年（688）郭祥夫婦墓出土



圖 2a 陶人面鳥 高 29 公分 中國安徽省
隋開皇六年（586）墓出土



圖 2b 陶人面鳥 高 24 公分 中國安徽省
隋開皇六年（586）墓出土



圖 3 千秋萬歲彩色畫像磚 38 公分 × 19 公分
中國河南省鄧縣南朝墓採集



圖 4a 「千秋之象」、「萬歲之象」榜題人面鳥
朝鮮平安南道德興里高句麗永樂十八年（409）古墳天井



圖 4b 同 4a.「千秋之象」、「萬歲之象」榜題人面鳥 線繪圖
朝鮮平安南道德興里高句麗永樂十八年（409）古墳天井



圖 5a 人面鳥身像
中國河南省洛陽西漢卜千秋墓壁畫



圖 5b 豬頭人身像
中國河南省洛陽西漢卜千秋墓壁畫



圖 6a 獸首鳥身畫像磚 中國江蘇省東晉隆安二年（398）墓出土



圖 6b 人首鳥身畫像磚 中國江蘇省東晉隆安二年（398）墓出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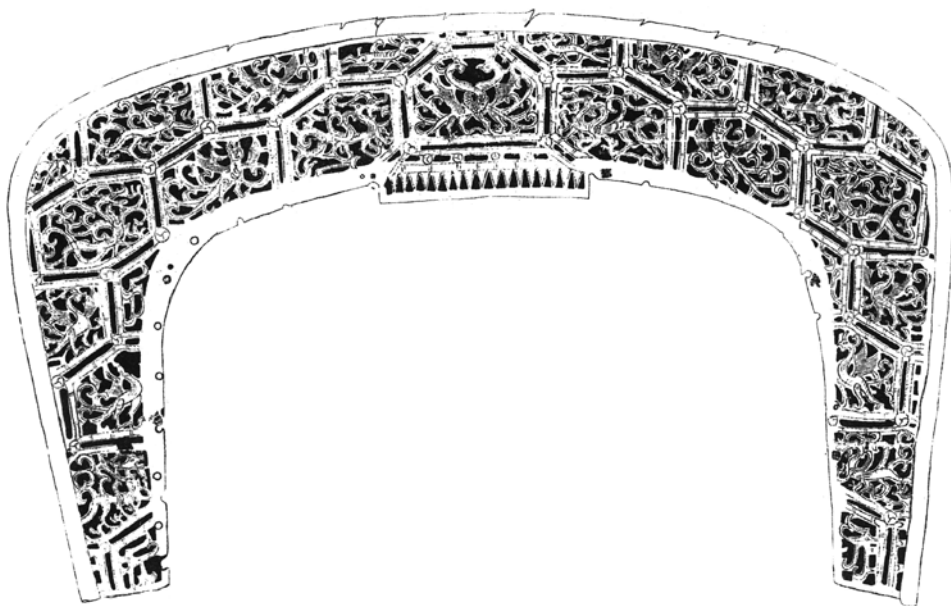


圖 7 銅鑲金馬鞍所見人面鳥身像 線繪圖 深 41.7 公分
中國遼寧省朝陽十二臺鄉前燕（88M1）墓出土



圖 8a 洛陽北魏永安二年（529）苟景墓誌蓋邊所見人面鳥 拓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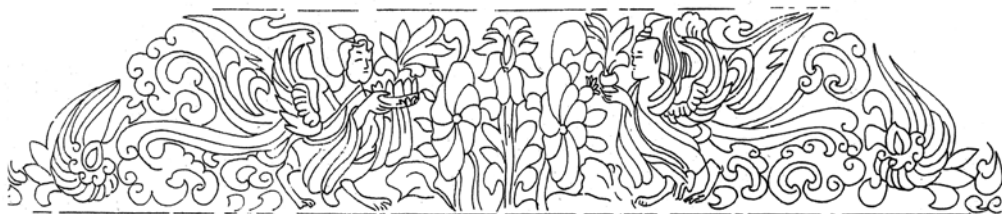


圖 8b 洛陽北魏永安二年（529）苟景墓誌蓋邊所見人面鳥 線繪圖



圖 9 北齊天保八年（557）
千秋·萬歲畫像磚
線繪圖



圖 10 「□齊天保□年」人面鳥畫像磚
殘長 48 公分 寬 20~29.5 公分 鄴城考古隊藏



圖 11 大魏興和二年（540）千秋·萬歲畫像磚拓本 長 16.1 公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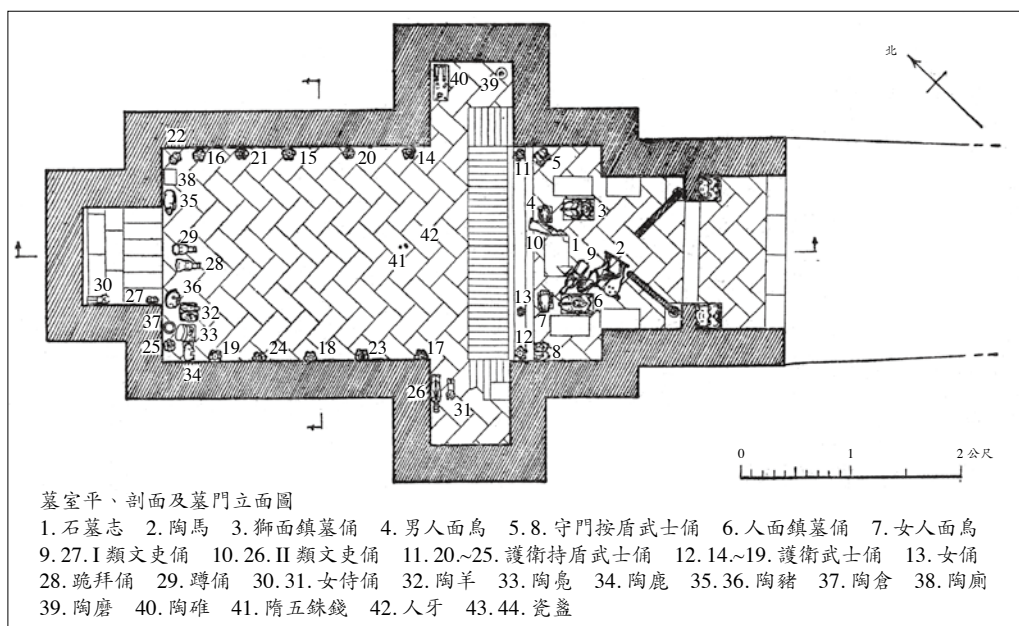


圖 12 中國安徽省隋開皇六年（586）墓平面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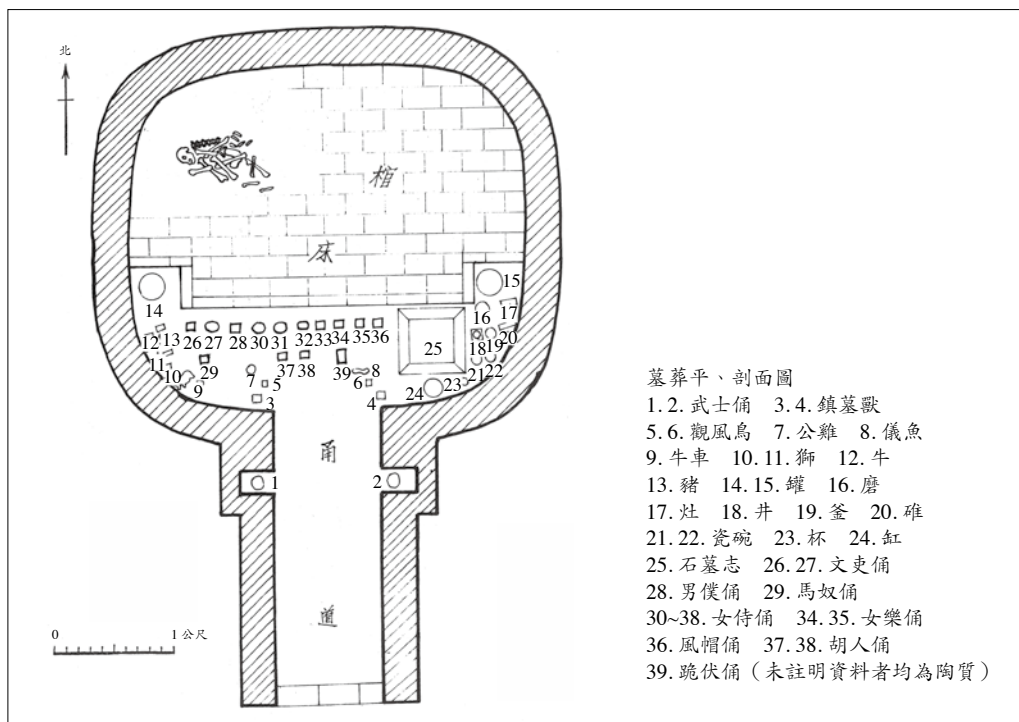


圖 13 中國河北省唐垂拱四年（688）郭祥夫婦墓平面圖



圖 14 陶人面鳥 高 15 公分
中國河北省唐咸亨元年
(670) 孫建墓出土



圖 15 陶人面鳥 左 17.5 公分 右 24.5 公分
中國河北省定縣唐墓出土



圖 16 陶人面鳥 (線繪) 高 16.6 公分
中國河北省安國市唐墓出土



圖 18 陶人面鳥 中國河南省上元二年
(675) 楊儼墓出土



圖 17a 陶人面鳥 高 19.3 公分 中國河北省邱縣光宅元年（684）袁翼夫婦墓出土



圖 17b 陶人面鳥 高 18.1 公分 中國河北省邱縣光宅元年（684）袁翼夫婦墓出土



圖 19a 陶人面鳥 殘高 8.3 公分 中國河南省鞏義市二紙廠唐墓 (M1) 出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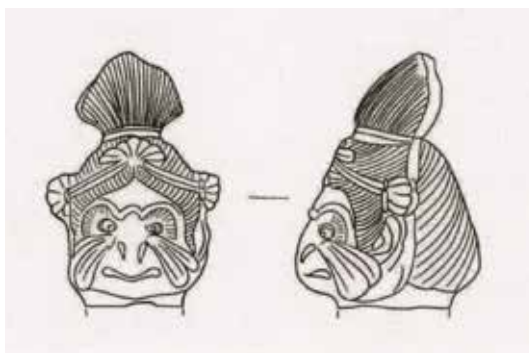


圖 19b 同 19a 陶人面鳥 線繪圖
中國河南省鞏義市二紙廠唐墓 (M1) 出土



圖 20 陶人面鳥 高 27 公分 中國遼寧省朝陽黃河路唐墓 (M1) 出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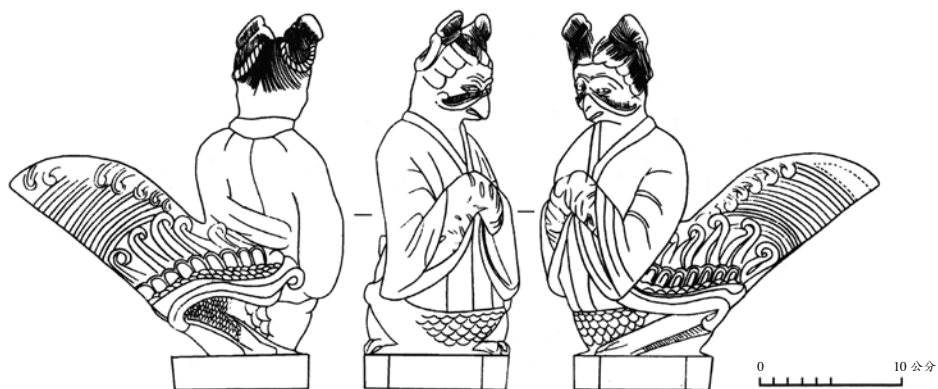


圖 21 陶人面鳥 線繪圖 中國遼寧省朝陽黃河路唐墓（M1）出土



圖 22 陶人面鳥 高 15 公分
中國湖南省長沙牛角塘唐墓出土



圖 23 青釉人面鳥 高 15.6 公分
中國湖南省岳陽唐墓（M4）出土



圖 24 青釉人面四足翼獸 高 17 公分
中國湖南省岳陽唐墓（M4）出土



圖 25 青釉人面鳥 高 8 公分 中國四川省
唐貞觀五年（631）冉仁才墓出土



圖 26 陶人面鳥和人面四足獸 左 19.5 公分 右 23.3 公分
中國湖北省武昌唐墓 (M161) 出土



圖 27 陶人面鳥 高 12.5 公分
中國湖北省武昌唐墓 (M13) 出土



圖 28 陶人面鳥 左 16.5 公分 右 12 公分 中國湖北省武昌唐墓 (M439) 出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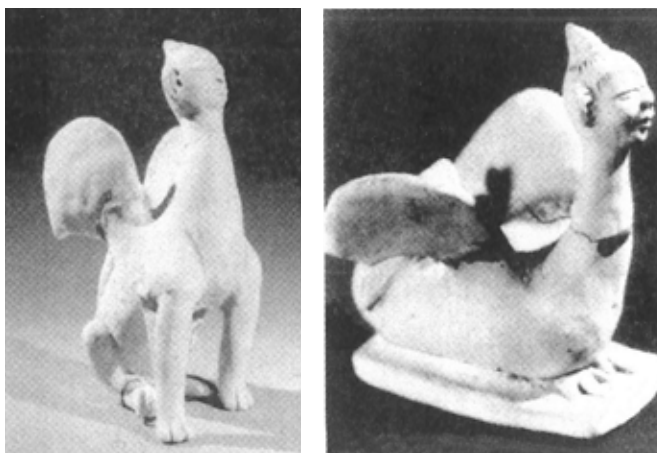


圖 29 陶人面鳥 左 20.1 公分 右 18.5 公分
中國湖北省武昌唐墓 (M401) 出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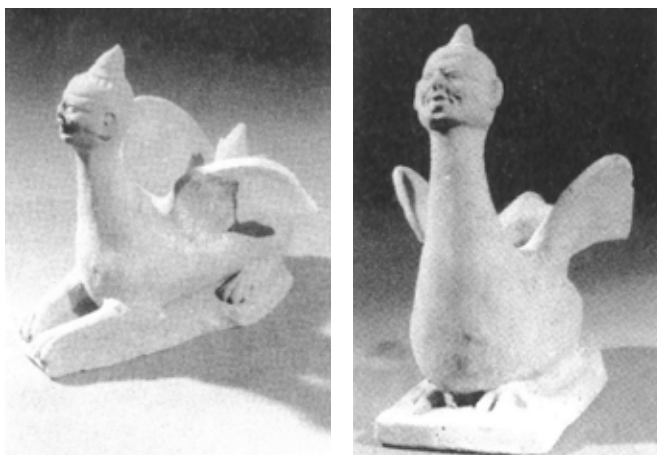


圖 30 陶人面鳥 左 16.8 公分 右 17.4 公分
中國湖北省武昌唐墓 (M434) 出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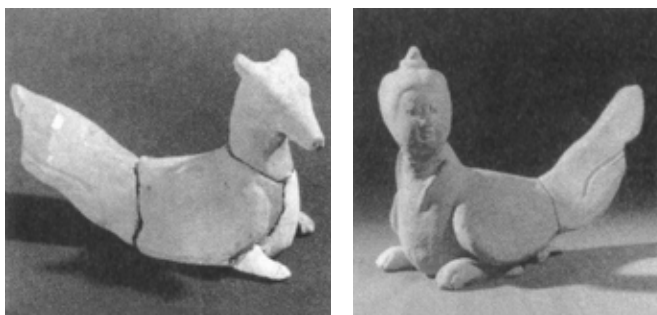


圖 31 陶人面鳥和獸面鳥身 左 11.5 公分 右 15.6 公分
中國湖北省武昌唐墓 (M76) 出土



圖 32a 陶女面鳥 高 20 公分
中國江蘇省銅川隋墓出土



圖 32b 陶男面鳥 高 20 公分
中國江蘇省銅川隋墓出土



圖 33a 陶女人面鳥 高 20 公分
中國江蘇省徐州市唐墓 (M2) 出土



圖 33b 陶男人面鳥 高 22 公分
中國江蘇省徐州市唐墓 (M2) 出土



圖 34 中國河北省邢窯窯址出土標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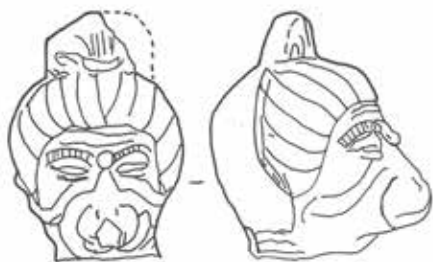


圖 35 中國河北省邢窯窯址出土陶女人面鳥頭部標本 線繪圖 殘高 5.2 公分



圖 36 素陶加彩人面鳥 高 16 公分



圖 37 中國陝西省大象元年（579）安伽墓石門額 線繪圖



圖 38a 陶人面鳥
左 16.7 公分 右 23.3 公分
私人藏



圖 38b 同 38a 背面
右邊女人面鳥背有「吉利」墨書



圖 39 「吉利之象」榜題獸首鳥身像 朝鮮平安南道德興里高句麗永樂十八年（409）古墳天井畫